

馮 定 著

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
性格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
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

人民出版社

3(2)

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
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
進行鬥爭的問題

馮 定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年 · 北 京

書號：1071

**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中國
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

者：馮 定
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行者：新 華 書 店
刷者：外 文 印 刷 廠

145.001—250.000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二年六月北京四版
定價(甲) 1.200 元

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無論是分析問題或瞭解事物的本質，無論是規定戰略、策略以及每個具體的政策，無論是組織革命的隊伍或指揮革命的戰鬥，都無不是既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或原則，又合於中國的歷史條件和實際情況的。毛澤東思想這種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性與深刻性，在中國工人階級不僅和農民、小資產階級而且也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的關係中，也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資產階級作爲階級來說，不論何時何地，其性格彼此間總是共同的。但同是資產階級，在初期與在後期是有區別的；同是在後期，在資本主義國家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是有區別的；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革命勝利前與在革命勝利後是有區別的；此外，各種類型的資產階級，也同樣在其共同的性格中又各有其特殊的性格。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既從一般的資產階級方面而掌握其共同性，又從中國的資產階級方面而掌握其特殊性，所以認識是異常透澈的，因而當爭取其加入民族、民主統一戰綫的時候，當爲了團結而必須進行批評或鬥爭的時候，都是異常正確的。

資產階級是以血污起家同時也有其歷史光榮的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起家原來就是極不乾淨的。資產階級除了貪得無厭地而且殘酷地剝削工人階級外，在資本的原始積累中，爲了掠奪和搶劫殖民地人民的財富，對殖民地人民曾進行欺騙、迫害、鎮壓、屠殺，其強暴與野蠻，簡直是沒有言語可以表達的。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曾經說：『這種剝奪的歷史，是以血與火的文字，寫在人類記錄中的。』（見郭王譯本卷一第六〇九頁）又說：『資本出現世上，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滲透着血和污物。』（同書卷一第六五〇頁）這些話絲毫也沒有過分。我們這裏必須再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的一段話，因爲這段話描寫初期資產階級是非常淋漓盡致的；這段話說：『資產階級，到處，在它得到了統治的一切地方，破壞了封建的、家長制度的醇樸的關係。它無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複雜的封建網絡；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與冷酷的「現金交易」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關係了。它把宗教的虔誠，勇士的熱忱，俗人的多愁善感等等底莊嚴的激發沉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底個人才能變成了交換價值，它用一種無良心的貿易自由去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不可廢棄的自由。一句話，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去代替了用宗教與政治的幻想掩蓋着的剝削。資產階級取消了以前認爲可敬

的、被誠惶誠恐地崇拜的一切行爲底神聖的威嚴。它把醫生、律師、牧師、詩人、科學家變成自己出錢僱傭的勞動者。資產階級扯掉了家庭關係底動人的、多情的紗幕，並使之變爲純粹的金錢關係。」（見解放社博古校譯本二十五頁，着重點原來沒有的）

然而資產階級在其發生與發展的時期，雖用卑鄙醜惡強暴野蠻的手段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可是終究因此也就「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見『共產黨宣言』二十五頁）。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既罵了它，也贊了它，認爲「在它不到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了比一切過去各代加起來還要更衆多更偉大的生產力」（見二十八頁）。新興的資產階級，對內摧毀了封建制度的統治，對外成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十六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十七世紀英吉利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十八世紀末（一七八九年）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使西歐主要諸國的資產階級都掌握了政權，因而使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開闢道路。自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至一八七〇——七一年間的普法戰爭，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在西歐與美洲業已勝利與確定的時期，資產階級在這個時期裏，不管爲了追求不知鑿足的利潤是多麼不夠『文明』，多麼無恥透頂，然而在政治上終究還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能够起領導的作用。

資本主義世界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漸趨褪落與喪失而走向反革命

資產階級當其尙能領導革命的時候，不管實質上只是爲着資產階級的利益，總是冒充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去反對封建貴族和僧侶們的，總是冒充代表整個民族的利益去反對外來的侵略和壓迫的。然而當人民覺悟起來爭取自己的真正利益和要求的時候，特別是當工人階級成立了工會並建立了自己的政黨爲着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來進行鬥爭的時候，它的革命性就愈來愈褪落，思想上也就不再進步而趨反動了，就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吧，也不願尊崇不敢提倡了，而回到唯心主義與僧侶主義的『茅坑』裏去了。它寧使勾結或投降封建君主和地主階級，而民族利益也日益置之腦後了。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莫斯科工廠委員會與職工會聯席會議上的講詞中曾經說：『我們往常說過了，——而多次的革命也恰好證實這點，——就是當事情涉及經濟權力，剝削者們經濟權力的基礎的時候，涉及他們的財產的時候，這些財產是使數千萬計的工人與農民的勞動歸他們支配的，是使地主們和資本家們有實行壓榨的可能的，——重說一遍，就是當事情涉及資本家們和地主們的私有財產的時候，他們也就忘記所有自己關於愛祖國愛獨立的語句了。……當事情觸到階級利潤，資產階級也就出賣祖國並與隨便什麼的外國人進行買賣勾當來反對自己的人民了。這個真理，俄國

的革命歷史再次三番地說明了，正像百餘年來革命歷史給我們說明了似的，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階級政策的法則，在一切時代裏，在一切國家裏，就是如此。」（譯自『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頁）

百餘年來的歷史，確是無情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由革命性到反革命的醜惡演變。資產階級在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大革命中，革命的精神算是非常飽滿的，可是一八四八年普魯士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就已沒有一七八九年法蘭西資產階級那樣生龍活虎了，而爲了鎮壓工人階級就已經開始寧使和反動的貴族去進行妥協。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階級的起義與巴黎公社的成立，標幟着西方資產階級的革命性的喪失和結束。巴黎資產階級在公社成立前的圍城中曾大發國難財，並且正當人民挨苦受難奮起衛國的時候還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資產階級的政府不許工人成立軍隊，而寧使和敵人訂立了屈辱的和約，爲的就是當公社一經成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將軍就進兵來對公社實行血洗。可是巴黎公社雖被資產階級的反動武裝摧毀了，終究還是歷史上工人階級第一次給予資產階級以嚴重的打擊，資產階級因此愈益胆怯起來。嗣後似像在奧匈、在俄國、在日本及其他各國，那裏的資產階級因爲形成爲階級比較更晚，所以反動性愈益暴露，乾脆就向君主和貴族叩頭屈膝了。

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也就是列寧說的到了「垂死的」階段。在那裏的資產階級不但完全喪失了革命性，而且成爲革命的對象了。正像列

寧說的：『在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和憲法周備的文明先進的歐洲，已經到來了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發號施令的資產階級，因懼怕日益增長和日益強大的無產階級，便支持一切落後的、衰亡的、中世紀的東西。日益衰亡的資產階級，同一切已歸衰亡和正在衰亡的勢力聯合起來，以圖保存正在動搖的僱傭奴隸制度。在先進的歐洲發號施令的是支持一切落後東西的資產階級。歐洲在今天之所以是先進的，並不是由於資產階級，而是違反資產階級，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使那爭取美妙的未來的百萬大軍日益增大起來，只有無產階級才保存和傳播對落後、對野蠻、對特權、對奴隸制度、對人侮辱人的無情仇恨。』（幹部必讀本『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第四十二頁，着重點原來就有的）總而言之，從人類整個世界範圍與全部歷史發展來說，資產階級革命的舊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已經『呼之欲出』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則還有一定的革命作用

當整個世界已經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已經成爲革命對象的時候，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倒還『餘勇可賈』。這是因爲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來說，帝國主義國家是決不允許其也像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來發展資本主義，而爲了間接地與直接地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命

脈，除了實行直接的武裝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外，總是盡一切可能地培養與扶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一切根深蒂固的封建反動勢力，因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深切地感覺着窒息的痛苦，就是和封建君主、軍閥、官僚、地主階級妥協起來僅僅希望用改良主義的辦法來發展資本主義，也極少可能。這樣也就使得『……在亞洲却還有能够代表真實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見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同上書第二十六頁，着重點原來就有的），而這個『資產階級還與人民一同反對反動勢力』（見列寧：『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同上書第四十三頁，着重點原來就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民族資產階級，不管其本身怎樣軟弱，也就這樣顯示了『後來居上』的樣子，演奏出資產階級在革命事業中的『尾聲』。

列寧與斯大林都會一再地評價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意義。列寧很注意中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在指出孫中山先生『談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的「經濟革命」』的同時，曾譽孫中山『是充滿着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高尚精神與英雄氣概』的。（均見同書『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一文中）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與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在國際和國內的情況和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從國際來說，這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已經真正開始了，從國內來說，這就是比資產階級更強大更堅決的領導革命的階級業

已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了。國際國內這些新的情況和條件，決定了中國社會就是在革命勝利後也不可能走向資本主義，而必須走向社會主義。正像毛澤東同志後來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所分析的，『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孫中山先生在這樣新的情況和新的條件中並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進了一步，這正是其非常偉大的地方；所以毛澤東同志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够「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論』）

新三民主義在實行推翻帝國主義與反動勢力統治的當中，基本上是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相接近的。所以一九二三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定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幫助國民黨改組，使之成爲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是符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大會上也正是堅持了這個正確意見的。

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緊急關頭動搖叛變

然而由於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和深刻，即使資產階級在和人民合作的時候，也能看出它的反動尾巴。我們今天讀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篇文章以後，就可知道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間，毛澤東同志關於資產階級在革命險孔掩飾下的反動尾巴，就已經發出警號了。這個警號的發出，不僅是因為當時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而國民黨的領導權已落在野心家蔣介石的手裏，而且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認識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而來的。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裏，首先撇開了買辦階級，認為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的附庸，然後論及中產階級說：『這個階級代表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着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中產階級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又說：『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綫。』

毛澤東同志不但對資產階級的右翼發出了警號，而且對資產階級的左翼也發出了

「提防」的警號。這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所以在國際國內新的情況和條件下還在參加革命，主要的是想利用業已過去了的、腐朽了的「革命老牌子」，來奪取革命的領導權；這種領導權的奪取，為的並不是使革命貫徹到底，而是使革命當已經相當地滿足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時候，能够「適可而止」，或者是事實上決不可能「適可而止」的時候，多少可以有些資本去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討價還價，而實行對革命的變節。

毛澤東同志這種灼知與卓見，恰巧和當時的陳獨秀機會主義相反，陳獨秀機會主義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進步的一面，沒有警惕其反動的一面，所以當資產階級既震懾於人民力量的風起雲湧而又受革命敵人威迫利誘因而表示動搖的時候，不是對資產階級進行批評和鬥爭，而是完全對資產階級表示遷就，結果並不是爭取了資產階級，而是促進了資產階級對人民的瘋狂進攻與對革命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妥協投降。

中國一九二四——二七年間的革命，終於遭受失敗了。這個失敗的原因：從革命的敵人來說，其力量是比較強大的，因為國際帝國主義不但始終扶持着中國的封建軍閥、官僚、地主等一切最反動的勢力，而且還親自出手露面，橫加干涉。但不管敵人怎樣強大，假使革命陣營內沒有資產階級的動搖，沒有蔣介石集團的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相互勾搭而實行叛變，形成反革命對革命的裏應外合，那麼革命也許不會失敗，失敗了也決不如此慘重。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間的革命是失敗了，幸虧有毛澤東思想的存在，並在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下重新組織了革命的力量，建立了革命的武裝，乃至創造了革命

的根據地，革命終於又向上高漲起來。不然，中國革命的勝利，也許更要推遲到不知什麼年月了。

中國的民族危機迫使資產階級又復「敗子回頭」

中國革命的道路不管怎樣迂迴曲折，可是辯證的毛澤東思想却永遠像燈塔一樣給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指示着明確的方向。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的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叛變而失敗了，蔣介石集團向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妥協投降的結果，自己很快就達到了大資產階級的地位，也就是發展而成爲官僚資產階級了，這時它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再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了。蔣介石集團從此變成了地主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變成了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也一無所獲，而其經濟上所感覺的窒息，也不是放鬆而是加緊了。因此，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開始以後，毛澤東思想又和『左』傾機會主義者不同，毛澤東同志在其一手創造起來的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的時候，從來就不主張對城市中小工商業者與農村的富農採取過『左』的政策。特別是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以後，中國的民族危機又復深重起來，毛澤東同志掌握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就預見到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還是能夠將資產階級爭取過來而發揚其革命的一面和抑制其

反動的一面的。

然而毛澤東同志在估計整個資產階級的同時，對於不同類型的資產階級，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澤東同志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篇文章裏說：『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係或者關係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為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着。』（這篇文章已載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裏。着重點原來沒有的，下面凡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都是如此）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分析和判斷是何等卓絕與英明！

毛澤東同志上述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其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猖獗，中國的亡國慘禍迫在眉睫，中共根據毛澤東思想的政策與策略，不但爭取了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一致抗日的主張下，由於廣大人民抗日運動的聲勢日益浩大與壯闊，也使部分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不得不被迫而同意抗日，這是因為正像毛澤東同志後來在抗日時期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本

小冊子裏所說的：『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尖銳地對立着的時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之下的買辦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戰綫。』這樣就爭取了國共再度合作，因而實現了一九三七年全國一致抗日的局面。

毛澤東同志一面主張聯合資產階級，甚至部分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一面又絲毫也不放鬆對他們的警惕，所以在上述同一小冊子裏又說：『在抗日戰爭中，親日派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或準備投降了。歐美派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尚留在抗日營壘內，也是非常動搖，他們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兩面派人物。我們對於大資產階級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堅決地打倒他們。而對於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則是用革命的兩面政策去對待，即：一方面是聯合他們，因為他們還在抗日，還應該利用他們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因為他們執行着破壞抗日和團結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沒有鬥爭就會危害抗日和團結。』這就是說，對於革命陣營裏的資產階級，甚至像頑固派那樣類型的資產階級，只要其和革命的當前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多多少少還有一點矛盾而表現不能完全公開地站在敵人方面，就應該像利用廢料和廢物一樣，盡量利用。但正是因為要利用其和敵人的矛盾而對革命有利的一方面，同時就必須尖銳地而又適當地批評與鬥爭其對革命不利

的一方面，這樣才能使革命事業不至於「得不償失」，而使革命陣營益臻鞏固而不致破裂；或者就是破裂了也不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損失。

官僚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分道揚鑣」

抗日戰爭勝利後，整個資產階級在客觀上是很想獨吞勝利的果實的，可是在客觀上，因為抗日戰爭是倚靠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堅持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最後出兵而獲得了最後勝利的，所以資產階級要想獨吞是不可能的。但毛澤東思想從中國的歷史條件與實際情況出發，不管整個資產階級多麼想獨吞勝利的果實，對整個資產階級裏面的各別類型仍復採取了各別的看法和辦法。頑固的大資產階級，也就是歐美派大資產階級，這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中間在抗日過程中總算還沒有公開成爲漢奸的部分，這部分在抗日過程中不但沒有窮困起來，而且反而發了國難財，都變得肥胖的「白華」；他們當抗日戰爭結束時，於是在一定程度上與一定時間內所有的由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的矛盾而對革命有利的東西，這雖然在抗日過程中本來就是愈來愈稀的那麼一點兒，也已隨着消逝，實質上只留下賣國賊與獨裁者的靈魂了。他們不但想獨吞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而且已經吞下了不少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可是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都要求和平，而他們的本質和本相也不是迅速便被當時在解放區以外的人民，